

# 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 ——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王 义 桅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探索了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普适性的科学,往往从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而忽视其历史演变过程、国际关系艺术层面的内涵以及当今世界多种国际关系体系并存的事实,产生种种悖论,本质上成为维护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的阶级学说,即所谓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它必然要被确立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五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真正实现国家性回归、包容不同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所否定。

**【关键词】**国际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庸俗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王义桅,1971年生,国际关系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上海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2)09-0004-07

### 导 言

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在争论和妥协中前进,在各执一词下演绎而难有革命?致使“没有哪种单一方法能抓住当今世界政治的所有复杂性”。人们不禁要问,各派国际关系理论间论战的症结何在?国际关系理论是谁的理论?是为什么的理论?它是一种普适性科学还是特定的艺术形式?种种因素,使得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必要。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各异,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时空体系中,有的处于前主权时代(如处于领土争端、政府失败、人口不固定状态的欠发达国家)、有的处于主权时代(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的处于后主权时代(如欧盟国家)……这就为着眼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主权现象及非民族国家和非主权现

象同时并存、交互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近代西方(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提炼概念、产生观念而发展起来的,特别针对西方国际关系体系。而东方国际体系、未被表达的边缘国家、甚至前民族(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能尚未形成严格的国际体系)却没有理论加以阐释,只好借助现实主义的无奈逻辑或批评理论的极端抱怨而得以抚慰。而一旦这些后发达国家崛起,其意志必将在国际体系中得以表达,从而产生解构西方霸权式国际体系的要求与可能,蕴涵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革命。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批判。

###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十大诘难

#### 诘难一: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 30.

国际关系概念的确立是以区别于国内事务而开始的,偏重于国际政治内涵,其区别标志首要的是认为国际关系是在不同的逻辑下即无政府状态下演绎的。这是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源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或霍布斯讲的战争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国家的理性、自私性暴露无遗,因而有了以国家中心论(state-centrism)为标志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假定,即“国家人”的假定。正如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导致了经济学的局限性一样,国际关系的“国家人”假定,与其无政府状态先验性认识一道,共同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

在温特之前,鲜有理论挑战这一前提。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摩根索从人性本恶、权力本恶这一典型的西方政治哲学认识出发,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无不为权力、利益而斗争。结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华尔兹进而把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圭臬的无政府状态解释为:国际社会犹如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则以国际机制来修订人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使之有序化;但是也只有入流的国际关系才被有序化,非入流国家仍导致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文表明,民主和平论将这一认识发展到赤裸裸的境地。

温特振聋发聩地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其建构主义理论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为入流的国家与非入流国家规定了文化圈,即主流西方国家的主导无政府状态文化是洛克型的、非主流的非西方国家则仍挣扎在霍布斯型无政府状态文化之中,但是主流与非主流国家可以组合出康德文化的氛围,即成为朋友、组成集体安全体……大有将国际关系的虚假前提“虚化”之势。

这种虚假前提的理念认识是先验性的。

诤难二:国际关系理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上文指出,为了虚拟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前提,国际关系学者借助康德哲学虚拟了国际关系从自然状态、公民状态到应然状态的演绎逻辑,并分别对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各流派。

民主和平论、大战过时论、“中国威胁论”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先验论性质。其世界观即是“观念创造理论”——民主是好的,和平也是好的。只有好的才能派生出好的(和平),反之,恶的必然导致恶

的(战争);民主国家在历史上把仗打完了,这才有今天民主国家间的和平。故民主和平论是本末倒置的言论。大战过时论也有类似的逻辑错误。尽管不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但作为支配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如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心理律动之一——“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自我实现预言的又一典型例证——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约瑟夫·奈语)。

现实主义基于历史(主要是欧美近代史)经验的历史循环论、悲观论思想看待世界,与自由主义一样都为建构主义的发展留下逻辑空间。

米斯海默教授在其新书《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二战”后期,苏联在满洲取得了对日本关东军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日本已遭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苏联,更不用说亚洲了。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苏联的重任。”如果这种先入为主的逻辑成立,以下说法也就不会否认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势力急速膨胀,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德国已遭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美国,更不用说亚洲了。因此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美国的重任。

理念(视角)一变,结论完全倒过来。这说明,现实主义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埋在水里的是建构主义所揭示的观念因素。现实主义的公理(即现实主义者潜意识中公认的价值观)正是建构主义的命题。国际关系理论者也是概念制造者(image-makers)。

米氏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

See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67.

See Kenneth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 - Wesley, 1979.

See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pp. 391 - 425.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96页。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260 - 261. See also p. 355.

要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事实上,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而苏联则不然。”

在这一点上,强调身份与认同的建构主义也不例外。米氏在书中还写道,“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先进法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改变了。直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它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同样,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美国在40年代前期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这一美国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原始民主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这说明,所谓身份与认同仍然是服从于战略利益的需要,是需要方主观界定的。

下文将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一种先验论和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且是西方式、美国式理论,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阶级理论。

### 诘难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中,层次分析(level analysis)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对其理解各有不同。一种典型的说法是将国际行为体分成世界系统(World System)、关系(Relations)、社会(Society)、政府(Government)、角色(Role)、个人(Individual)六个层面,并笼统地区分为国际与国内或宏观与微观两大领域。而这两大领域又常常相脱离,或更多地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就是国际政治由国内事务所塑造并根源于国内事务”了事。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尤其强调单元层次(unit level)、系统层次(system level)。温特的建构主义以施动者(agent)-结构(structure)分析见长,其无政府状态的三段论分析,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关系中的同化与异化律,但仍解决不了观念、身份与认同等的原生性问题——观念、非理性因素从何而来?背后起作用

的仍然是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注重今天的结果(状态),而忽视导致结果的历史根源。建构主义对此有所超越。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视动态、渊源,着眼于结果而非过程,基本上属于静态的理论范式。决策学好些,如博弈论(game theory)、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等强调过程、机理,但有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即所研究制度背景是美英模板。国际机制理论强调了体系与过程,有所超越,但一样也依赖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

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应当是国际关系领域思维方式的阐释而非思维结果的总结,注重理论演绎过程而非结果、探索而非定论。忽视非对称性因素,忽视反作用,宏观-微观、动态-静态割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故而,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但各派论战往往不是就国际关系的根本矛盾进行,而是侧重点的偏好或方法论倚重而导致的争执。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形而上的属性,致使它没有革命,而更多的是理论循环、各派并存,各唱各的调。

### 诘难四: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

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不外乎是客观与主观两种。前者即指国际关系实践,既有历史发展趋势,如全球化,也有偶然事件,如“9·11”事件。实践动力带给国际关系理论滞后性、阐释性色彩。

后者包括学科与人的因素,包括人类认识与观念的变迁。由于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的不够严谨、不够科学,故常常循环往复,鲜有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科学革命(至今仍借助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往往都是靠外界(经济学、科学哲学——如华尔兹新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社会学——如温特建构主义)推动,自身的动力不足。尽管流派纷呈,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歧仍然局限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之间或由此引申,尚未发现其他根本对立面。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没有革命的重要学理

Ibid, p. 24.

Ibid, pp. 26 - 27.

Bruce Russett, H. Starr, and D. Kinsella, *World Politics: A Menu for Choice*,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p. 13.

参见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原因。致使国际关系理论局限于学理空间挤来挤去,无新创时空体系,无宏体系、宏理论,只有“范式间”的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各派强调其他派别忽视或忽略的地方,希冀在片面中求深刻,而跳不出西方框架,更多的是学派(schools)、方法(approaches)、论调。

由此可知,除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是西方阶级理论,是为西方既得利益服务的,因而是保守的。这种保守性尤其体现在其阐释性使命上。现实主义流派倾向于为现状辩护,自由主义学派倡导改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主张激变。因而国际关系理论只有方法论上的变革而无社会意义上的革命。

#### 诘难五:国际关系理论是阐释性理论

布卢斯·拉赛特等所著《三角和平》前言部分开篇即将国际关系研究类比为全球定位系统(GPS)式分析,反映了国际关系对可操作性的渴望,即现实需求催生理论,理论解释现实。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关怀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奠定了这一基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和平的渴望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面世。人们由此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合理性。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国际领域不同于国内领域,国内是线性发展和进化的场所,而国际领域却全无这些特征,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现象。因此从国际上看,只有外交学,而无国际关系理论。他进而指出“国际理论与外交实践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国际理论实质本身”。批判理论进而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

特别地,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地阐释各国外交政策,而尤其是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从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更一般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肩负阐释西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的使命(下文将予以分析)。

正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为实践开道的使命,故往往无前瞻性——没有哪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预料到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偶然性。由于国际关系科学、艺术性的统一属性,国际关系理论也难以寻找到其规律性。

#### 诘难六:国际关系理论是强者的逻辑

直觉告诉我们,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前提有利于谁?还不是强者、既得利益者?!事实上,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预设前提是强者逻辑的流露,而且核心概念与原则也存在强权逻辑的陷阱,如“权力”的定义即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对抗型界定,主权平等原则只是安抚弱者的托词——主权能平等吗?即便如此,各国维护主权的能力也是不平等的!

国家中心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典型特征,它将“国家作为支持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和解释的要素”,便是对非国家行为体和非对称性因素的强权逻辑。尤其是,国家中心论实质是大国中心论,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只是作为大国权力、市场角逐的场所而存在,世界资源,尤其是地缘性极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大国政治的玩物,其他地区到处是被权力政治遗忘的角落。

自由主义理论柔化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现实主义的赤裸裸强者逻辑,而代之以隐性的机制霸权;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为国际资本规律找说法,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者逻辑;建构主义更是要让人忘却历史上的歧视与现实的不平等,代之以朋友、平等的诱惑。但如前文分析的,仍然解决不了原生性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强者逻辑的观念化。

在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理论更是又一种形式的强者逻辑,即男权理论。她们试图冲破这一强者逻辑,以女性主义世界观改造之,但构不成主流,且有矫枉过正之嫌。

强者逻辑更准确地说是既得利益者的逻辑。典型的说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核不扩散、核禁试等,并且还往往打着人类和平、正义的旗号。

#### 诘难七:国际关系理论何以往往冠名为“西方”?

在国际关系史中,西方是强者,甚至定义国际关系

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reface.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 Butterfield and M. Wr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pp. 17 - 34.

Robert Cox, "Social Force,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4 - 254.

Kjell Goldman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Robert E. Godin and Hans - 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Press, 2000.

历史就是以近代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对欧洲国际关系史的总结,受当代国际关系实践的推动,其概念来源、观念确立及佐证资料,无不源于西方文明,服务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需要。

因此,西方话语体系——民族国家、主权——全部是西方概念,是西方近代史上打斗妥协的产物,许多并不适合东方;民族国家体系或主权体系也并非概括东方国际体系的特征和很好描述东方国际体系的逻辑。比如,人们经常将战国时期及三国时期的均势实践与近代欧洲的均势外交相提并论,是不妥的:战国时期等有均势之形而无均势之神。

但是,西方国家读完了野蛮读人权,以其人权观强迫其他国家遵循,是典型的霸道。除强迫接受外,西方的话语霸权还往往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评判标准。例如,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作用。欧美在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后,已经完成发挥民族主义的正面建构作用,而在今天批评、否定乃至憎恶仍处于正面作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是典型的先发逻辑。

近些年来,自由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强调国内因素、提倡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分析,部分实现了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尽管超越有限,但值得赞许。只可惜,“9·11”事件只会加重西方世界对非我族类的不信任,重弹“文明世界”的威胁老调,而没有变革国际关系理论思维。

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建构主义便是强化西方阵营认同感、重振西方的理论阐述。“历史终结论”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在古希腊理性传统与古罗马法制与强权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优越感及对非西方的忽视或不信任,便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布尔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曾指出:“对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印象完全是西方的,尤其是盎格鲁-美国主导的……如果存在起源和观点上几乎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它们能够传递对非西方世界支配的政治体系足够的理解吗?”

偏见往往源于无知,常常还伴随着傲慢。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每每称,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美国那样的经济、文化与军事实力……实际上,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成吉思汗帝国疆界远大于罗马

帝国。

但是,谁代表西方呢?正如布尔所言,盎格鲁-美国主导了西方国际关系世界。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盎格鲁-美国理论。

#### 诘难八:国际关系理论是盎格鲁-美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有无国界或特色可言?是否足够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稍微认真一点的思考即可发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一种美国式理论,如民主和平、全球化无不深深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甚至有人说民主化、全球化即美国化,美国学者理查德·隆沃思(Richard C. Longworth)说得好,全球化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市场经济的胜利;国际关系的母语是英语;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绕不开的逻辑即是美国的霸权。这恐怕也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焦虑所在吧。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霍夫曼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英国学派并未采取一种挑战姿态,而是补充之,哥本哈根学派作为一种和平研究学派而被美国学派吸纳。

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强者逻辑,故处于发达前沿的美国方能不断创新,新论百出;英国辅助之而“继续”分享往日霸权之气派;其他国家则付学习成本。美国霸权也极需国际关系理论的诠释,典型做法是把美国的说成是世界的,把相对的说成是绝对的,把局部的说成是全局的,把列强间的妥协说成是人类普遍意志……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以强者(美国)的视角描述了西方国际体系,可以说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却把它推广至整个世界,说成是普适性科学,种种悖论由此而产生。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确立主体性问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阐述美国视野中的世界,这与世界中的美国或美国之外国家的世界,或世界本身

参见笔者博士论文:《均势术、均势律与均势观念:历史的启示与理论的困境》。

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 - 1969" (1972),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8 - 209.

See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106(3), Summer, 1977, pp. 41 - 60.

是有出入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霸权与均势是两个对立的概念,那是因为世界认为美国搞霸权而美国认为自己是反霸的(反对别国搞霸权,阻遏其他国家挑战其霸权地位),自己推行的是均势(如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欧亚大棋局”);实际上,美国推行的是“霸权均势战略”。不明白这种国际关系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就不能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性、美国性本质。

国际关系理论的盎格鲁-美国式规定了其特征和先天性缺陷:“盎格鲁-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上。第一,存在国内与国际治理模式的基本区别;第二,从这种区别中有可能推导出对国家行为长期模式的宽泛解释。”故此也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振振有辞地在国内推崇民主而在国外推行霸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分所蕴含的理念是西方国际关系(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自身优越感的欣赏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根本上是由于非西方国家的存在及其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正如民主和平论所揭示的,其重要表现是,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处处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把别的国家说成是挑衅性的(aggressive)、潜在霸权(potential hegemony),更不用说“无赖国家”了,而自己是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y)。如此美国化术语怎么能演绎客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美国式的西方意识形态理论。

对于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即除去美国因素的国际体系),哪种理论能够解释和准备去解释?人们不禁要问:是国际关系还是美国关系?素以“美国例外论”、“美国优越论”而自豪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何以能成为普适性理论?

#### 诘难九:国际关系理论是阶级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只是西方的理论和盎格鲁-美国式理论,更一般地说,它是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理论。

前面已分析过,无政府状态、国际机制等都是亲西方的分析(pro-western approaches),是为不断强化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合法化服务的。温特理论试图调和这种意识形态的歧见,力图寻找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中庸之道”。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是他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但是,什

么是行为体的原生身份与利益?在西方主导的当前国际体系下,只有“入流”国家,即角色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可的国家才有身份,为我族类者才有“认同”,因此身份与认同仍然是西方强化自身同盟的“话语霸权”。非国家行为体一定程度上似乎有所超越,但也只是作为全球化的附加产物而出现,未被表达的潜在行为体始终难有身份与认同。

建构主义进一步认为,“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为。而行为体的身份是由结构(文化)建构而成的。”温特动态化地假设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这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以强权、主权、朋友分别作为这三种文化的身份和认同的核心。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种文化也是在西方文化中兜圈子,是企图去历史化、去西方化、虚化国际关系理论阶级性的努力!

在第三世界对强权、主权日益失望和不满的背景下,温特学说推出“朋友”认同感,认为朋友-敌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实践而相互转化,以进化论代替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为使非西方世界“同化”入西方体系留下了激励空间,试图解决在强者逻辑式微的情形下如何整合西方、笼络非西方、强化西方认同同盟、稳固光大西方国际体系,巩固阶级合法化:“21世纪对外政策决策者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发现一种方式,既可以相互尊重主权的个体性,同时又可以把各国纳入建立真正的国际共同体的过程。”在这点上建构主义超越了民主和平论的强迫性、主观性、优越性。

#### 诘难十:国际关系理论是二元论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莫不亦然。

现实主义理论坚信人性本恶、权力本恶、国家本恶,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生存利益或安全利益),不信任、不依赖善良的道德约束,主张以恶治恶,结果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安全困境。结盟只是权力竞争的手段,盟友并不见得是朋友。

参见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Martin Griffiths, *Realism, 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interpre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face.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中文版前言”,《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页。

自由主义者则将世界区分为善的与恶的,认为好的必然带来好的,恶的必然带来恶的;而且这种善恶观念与生俱来,颇类似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一中国逻辑,因而主张通过好的国际机制将坏的变成好的,结果陷入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境地。

比较而言,建构主义则是乐观的理论,是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而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是悲观的理论和历史循环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按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分别对应敌人-对手-朋友三种角色,认为好的和坏的是一种观念、认同和身份作用的产物,“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这一点对政策的重要意义是:国家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友谊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在无政府状态下是可以实现的。”

这种敌-友式思维反映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非西方世界的忧虑,也蕴涵了非西方世界国际体系解构西方国际体系这一真正国际关系理论革命的可能。

除了敌友论外,国际关系理论的二元论属性还表现在善恶、物质与精神、国内与国际泾渭分明等方面。

##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许多理论还是一个家族,不宜一概而论,但其分歧是形而上层面的,以上诘难主要是就其总体传达的信息和人们对其印象而论。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在三个维度展开,综合具备三种视角,才能全面剖析国际关系作为科学与艺术相统一的属性,发掘国际关系自身生命力。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以科学手段涵盖艺术层面,试图表明西方的就是世界的,美国的就是西方的,未包含国际社会(西方社会)之外的行为体,故矛盾百出,悖论种种。其根本错误在于求同而不能存异,不能解决原生性不平等的问题,不能说明国家原生性身份与利益从何而来。这正是其阶级局限性。

这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根本对立,是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它以所谓的主权平等国家体系为借口,以无政府状态为幌子,将西方价值体系全球化,将西方式话语霸权体系合法化;各派分歧(基本围绕如何维护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展开)是次要的,内核(西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争论的目的正在于

完善西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试图以内部论战代替外在革命;其整体状况是:缺乏历史学家的深厚、哲学家的深沉,只有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主观化和想当然。

对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1. 单线进化论,或西方优越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近代欧洲历史为背景,是西方意识形态决定论;追求同质化,反对异质化,忽视差别;基本上是在无序-有序、分-合这两对“二律悖反”中兜圈子。

2. 全球化优越论,或美国优越论。国际关系理论相当程度是美国霸权压力下的产物,反映了强国意志,远未表达出人类的普遍理性要求。

3. 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主权陷阱”。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国家(尤其是大国)间关系及对称性作用力,对非对称性问题或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力忽视或重视不够,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

4. 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泾渭分明,抹杀国家个性。其无政府状态的虚假前提,导致忽视国际社会、非国家行为体逻辑。

种种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是一个领域或区域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钟爱军事,特别适合于霍布斯型无政府状态文化;自由主义侧重经济,尤其适于洛克型文化;建构主义强调文化,注重康德型无政府状态文化。其未来发展日益从不可通约到理论趋同,综合化趋势明显——“三角和平论”即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因此,它必然要被确立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间(一句话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五大“生命力”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真正实现国家性回归、包容不同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所否定。

[收稿日期:2002-05-09]

[责任编辑:邵峰]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前言”。

参见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三角和平论”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言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及国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See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